

从新发现的大冢牙璋谈二里头式牙璋结构的演变

刘佳林¹ 赵海涛² 许 宏² 何佩岭¹ 张 飞² 郭振亚³ 邓 聪^{1*}

1.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005;

3.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垱头村党支部, 河南 洛阳 471900

Abstract: The Yazhang artifac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enduring ceremonial jade artifact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carrying potential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This paper examines a Yazhang unearthed at the Erlitou sit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detailed features of its serrated side edges (Feiya). The analysis sheds light on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Yazhang artifacts at Erlitou. Furthermore, by re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al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rlitou-style Yazha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its stylistic evolution and broader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Yazhang, Erlitou, Shimao, Feiya

摘要: 牙璋被认为是二里头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高等级礼玉, 可能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本文新公布了二里头遗址大冢南侧Ⅵ区采集到的一件牙璋, 通过对牙璋扉牙的细部特征分析, 推测该牙璋制作年代介于二里头ⅤM3:4和ⅦKM7:5两件牙璋之间, 进而探讨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的早晚关系, 尝试重建二里头式牙璋结构形成过程。

关键词: 牙璋; 二里头; 石峁; 扉牙

2021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员张飞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垱头村村民、二里头第一件青铜爵发现者郭振亚交谈中得知, 他早年在遗址中采集到一件墨绿色玉器, 经过观察实物, 张飞认为该件玉器具备牙璋扉牙部分的特征。之后郭先生将玉器送至工作队驻地, 由在队工作的笔者等人进行实测研究。据郭振亚回忆, 该件文物系他年轻时在二里头宫殿区北, 大冢南侧附近拾得, 后一直保存在家中。经郭先生确认, 文物出土地点大概位于遗

*邓聪为本文通讯作者。

址第Ⅵ发掘区内, 该区域1984年曾清理出数座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贵族墓葬, 为贵族墓聚集区。以下将该牙璋称为大冢牙璋, 该件牙璋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牙璋特质, 本文拟从细部特征及制作工艺等角度探讨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诸牙璋的关系。

一 大冢牙璋的属性信息

大冢牙璋通体呈墨绿色, 残断, 仅存一侧扉牙以及柄部和本体的一小部分。(图一) 拾得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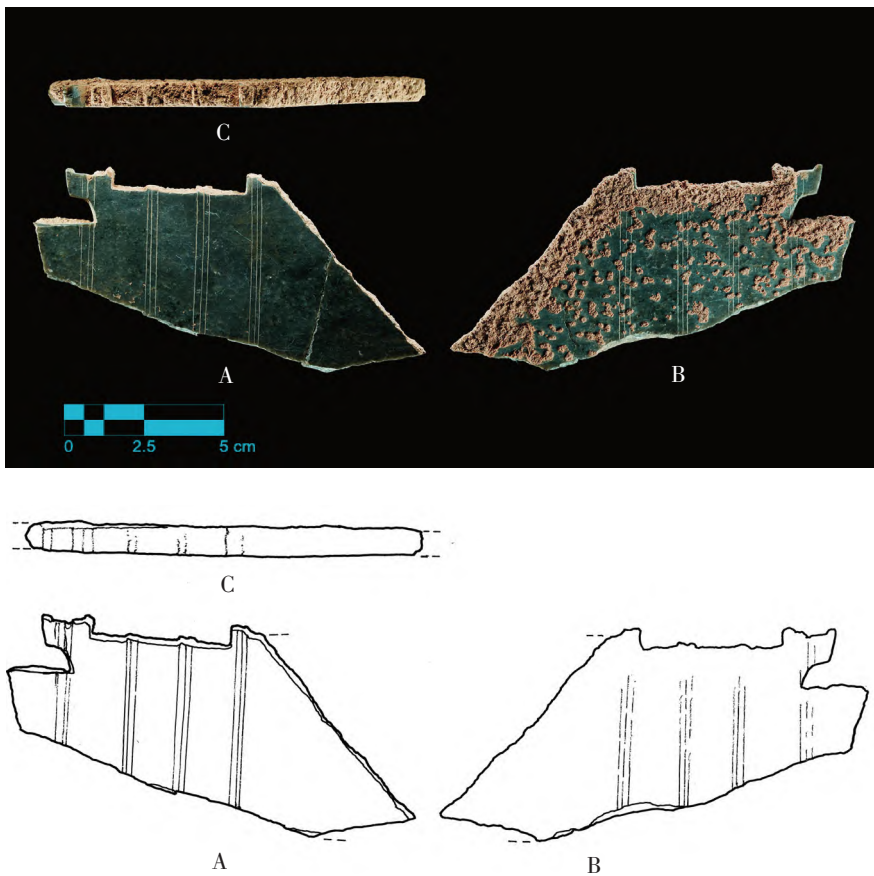
为自体断开的两碎片，断口吻合可拼接，应是埋藏前经过毁器处理，经郭先生粘连成一体。从断面观察可见矿物的颗粒状晶质结构。大冢牙璋B面及C面附有大量板结的土块和泥点，A面除少数泥点外，无肉眼可见附着物。残长10.49厘米，残宽5.31厘米，厚0.74厘米，整体造型上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牙璋风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该牙璋扉牙部位由龙（兽）头、小齿、大齿几部分组合而成，尽管C面已被结块土壤包裹，仍可辨识出小齿共两组，每组由两个小尖齿组成，这是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才出现的二里头式牙璋最典型的指纹特质^[1]，

即龙牙璋“4-2-2-1”扉牙的变体，延续了兽头和“2-2-2-1”的扉牙结构，两面均见垂直于扉牙的平行弦纹，以三条为一组，AB两面各四组。

扉牙长5.48厘米，参考二里头遗址既往出土四件牙璋扉牙的长度在5.91~7.44厘米的区间及器身总长都在50厘米左右的属性，可以推算大冢牙璋完整长度应在40厘米以上。

二 大冢牙璋的文化归属

大冢牙璋的年代归属，仍需借鉴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其他玉器，因此我们先对二里头遗址考古出土牙璋进行分析。二里头遗址迄今共出土牙璋四件，分别出于三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两座墓葬在分期上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一座墓葬被划归于第四期。尽管年代接近，牙璋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形态上的差别。具体而言，牙璋本体和柄部位置的形态都较为稳定，扉牙位置的变化最为明显，因此扉牙可能成为辨识牙璋年代早晚的



图一 大冢牙璋及线图

关键位置^[2]。第三到第四期之间的牙璋风格，反映出一个动态发展的趋势。邓聪与王方曾撰文指出，二里头牙璋具有普遍巨大化、龙形扉牙及三段台阶式的结构^[3]。巨大化，主要体现在牙璋的尺寸上，由龙山文化较为常见的20~30厘米，扩大至50厘米左右；龙形扉牙，指牙璋扉牙的前端，呈现张嘴龙头的形态，连同龙头身后的列齿和大齿，共同组成一个矫若游龙的形象，二里头之后的牙璋大多继承了这种扉牙传统；三段台阶式结构，指牙璋的本体、扉牙、柄部三段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三个整体，在侧边上呈现阶梯状起伏。龙山文化所见的牙璋扉牙全部都附在牙璋本体两侧，由本体伸展开，自二里头80 VM3:4始，出现了与本体、柄部有明确分界的扉牙，划分出一片独立区域，之间有成组平行弦纹分布。龙山时代牙璋的扉牙左右两侧一高一低是常态，而二里头所有牙璋，两侧扉牙均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上，虽然同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相较VM3:4来说，ⅢKM6:8扉牙形态较原始，且Ⅲ

KM6:8、V M3:5 两者的扉牙仍依附于本体两侧,未形成分段台阶式结构。可见在二里头式牙璋的传统确立之前,存在着一个二里头式牙璋的形成期,在形成期中,山东龙山式牙璋、石峁式牙璋的某些特征仍得以延用保留,而后又被摒弃取代,并且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际不断递进,最终诞生了以龙形扉牙为核心的龙牙璋,扩散至整个东亚。我们认为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传播继承关系,而是对知识、技能有意识地选择。

(一) ⅢKM6:8

Ⅲ KM6:8 牙璋(图二:3)的出土单位1976Ⅲ KM6为高等级贵族墓葬,从层位和典型器物的类型学上分析均属于二里头三期晚段^[4]。有多位学者曾指出,Ⅲ KM6:8牙璋的年代略早于V M3:4和V M3:5^[5]。以扉牙的形态观之,该认识十分合理。Ⅲ KM6:8牙璋的扉牙十分奇特,每侧扉牙都有两组列齿构成钳嘴形的突齿,突齿之间有一条起伏不规则的凹陷。两齿之间的起伏位置看似不规则,然两侧完全对称,凹陷也由带弧度条形砺石研磨形成,四处大小、形态相近的内凹夹着三处形状各异的凸起,或称之为细齿,可见该牙璋的扉牙是专门磨砺而成,且有着特定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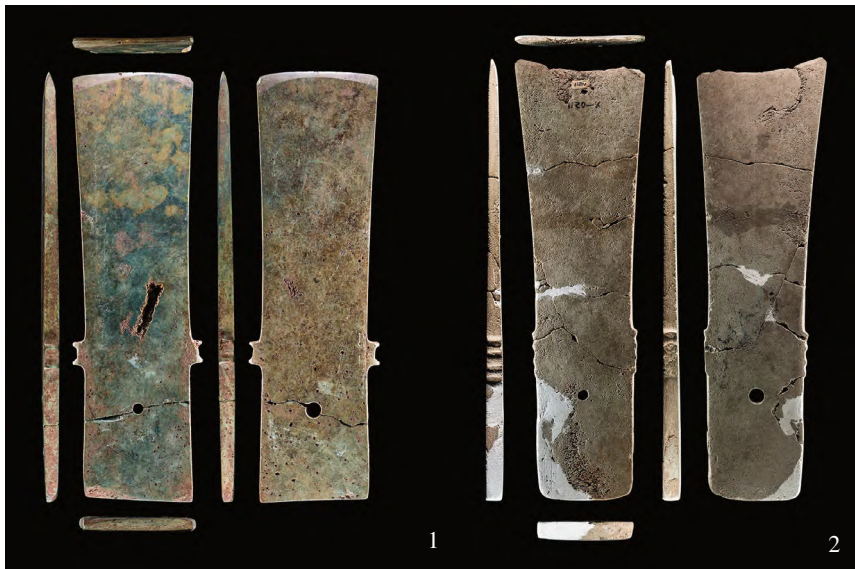
Ⅲ KM6:8牙璋的两个大型突齿极为特别,在二里头玉器中仅有82YLIXM5:1的玉刀上有相同的发现,邓聪将之命名为“列齿式”扉牙,可见

于山东大汶口及龙山时期的玉器上^[6]。相似的扉牙被施用于牙璋仅见于山东罗圈峪采集的YL:10牙璋(图三:1),经栾丰实考证,该牙璋应属大汶口晚期^[7],是目前所知最为古老的牙璋。除扉牙外,山东牙璋还为二里头牙璋贡献了本体和柄部沿器物中轴对称的特质,罗圈峪YL:10整体端



图二 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

1. VM3:4 2. VM3:5 3. ⅢKM6:8 4. ⅦKM7:5



图三 山东出土牙璋

1. 罗圈峪YL:10 2. 大范庄LD:211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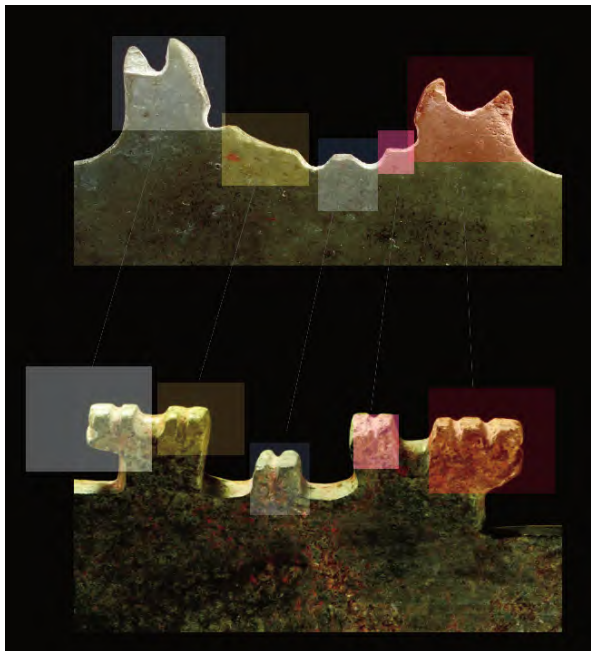
庄周正，左右两侧扉牙位于同一高度上，柄部整体沿牙璋中轴对称，底边平直，与左右两侧边基本垂直。

上述这些特征均在二里头牙璋中有普遍体现，而二里头之前，仅在山东龙山文化期大范庄LD:211牙璋（图三：2）、河南新砦期花地嘴牙璋中可以寻得其共性。邓聪、栾丰实等人也都已论述过花地嘴牙璋与山东牙璋的密切关系，看似二里头牙璋柄部的形态和扉牙的对称是承袭自新砦，实际上大汶口晚期的牙璋列齿传统为我们揭示了更为久远的文化记忆。ⅢKM6:8牙璋前后两齿也略有不同，看似形制一致，然而中间研磨出的凹字形开口却大小不一，靠近刃沿一侧较小，靠近柄部一侧较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种结构在VM3:5上也有所体现。

（二）VM3:5

位于圪垯头村公坟南侧的1980 VM3墓葬是二里头迄今为止出土牙璋最多的墓葬，VM3:4、VM3:5两件牙璋锋刃朝向一北一南置于墓葬正中位置。虽然埋藏时间相同，两件牙璋在类型学上，仍有诸多差别。邓聪指出，VM3:4和VM3:5代表了二里头式牙璋的两大类型，分别是侧沿三台阶型和侧沿平缓收束型^[8]，在向南中国的扩散过程中，二里头VM3的两件龙牙璋可以说是二里头式牙璋诸多特质的因素祖型。

VM3:5的扉牙由一大一小两背向开口的龙头组成，头位置已雕塑出典型的张嘴龙头造型，尤其是鼻部的刻画方式与绿松石龙形器如出一辙^[9]，是二里头时代最早的龙形扉牙。大头头上三齿，头后一处马鞍形凹陷又列有两齿，小头头上头后皆为两列齿，两头之间有一台阶式凹陷，凹陷中间列有一组列齿。从结构的视角来审视ⅢKM6:8、VM3:5牙璋的扉牙，可以发现ⅢKM6:8体现了带有龙山风格的形成期向二里头式龙牙璋演变的过程。在结构主义中，“结构”指的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之间存在固定的关系模式或规则。这些关系和规则构成了整体的内在逻辑和意义^[10]。如图四所示，两牙璋扉牙呈基本对称



图四 ⅢKM6:8与VM3:5扉牙结构

的结构排布，若我们将条形砺石所研磨出的U型凹槽视为一个独立单位，这些凹槽将ⅢKM6:8和VM3:5扉牙的各个位置区分成五个不同的组别，两牙璋的扉牙呈近似左右对称，ⅢKM6:8靠近柄部的齿较大，靠近刃部的齿较小，齿的大小差异，与VM3:5龙头一大一小之关系亦可一一对应，ⅢKM6:8凹陷出的三细齿与龙头后的列齿以及二层台阶下的列齿，也相互对应。（图四中同色区域）

以上，VM3:5牙璋延续ⅢKM6:8扉牙的排列规则，尽管构成这种规则的元素形态发生了改变，但是秩序性的象征结构以另一种方式传承，显示出两件牙璋在形制之外的联系，这种结构很可能代表着某种关联和暗示，在特定的情境中发挥作用。此外，两牙璋在墓葬中的位置及摆放方式尤为一致，均基本南北向置于墓葬中部位置，牙璋刃朝南向，可能指向墓主足部，在相同情景下显示出一致的使用方式和功能，VM3:4与VM3:5同出一墓，但刃朝北向，两件牙璋锋刃朝向完全相反，柄部错置，暗示着不同的意义。ⅢKM6:8和VM3:5的埋藏年代均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晚段，扉牙也具有相同的秩序结构，但从二里头式的龙形扉牙替代龙山时代的列齿来看，ⅢKM6:8的制作年代应略早于VM3:5。

(三) VM3:4

同墓葬出土的VM3:4与VM3:5两件牙璋的早晚关系,同样可以从扉牙的特征之中得到辨识。日本学者林巳奈夫首先指出两者扉牙制作工艺方面的差异,他认为“(VM3:5)在研磨好的凹陷上进行倒角并取出平面”,而VM3:4扉牙的制作则是石峁牙璋那类系统^[11]。如图五所示(图五:1、2),VM3:5牙璋的扉牙小齿之间的凹陷位置,均是先以手持的片或条状砺石在水平方向上研磨出一定深度,后改变方向,从上方垂直于凹槽的方向继续研磨,将凹槽两端的边缘打破,并向下延伸,通过先后两次不同方向的研磨,与现代工业倒角的程序几乎一致,因此林氏谓之“倒角”,其本质仍是以手持条形砺石在特定位置锉磨,形成高低起伏的表面,与龙山时代玉器流行的“减地”工艺本质相同。这类扉牙的雕塑工艺,同样见于大汶口—龙山时期牙璧类玉器扉牙的制作上。(图五:3)而VM3:4扉牙部分齿之间的凹槽,并非是马鞍形截面,而是矩形截面。深度远甚于VM3:5,且齿的形状整齐有序,虽然也是以锉磨成形,但两者之间却有根本差别。VM3:4牙璋齿与齿之间锉磨得十分平整,拔地而起。扉牙的工艺及风格相差迥异,很难认为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此外,两牙璋扉牙的排列结构亦差距较大,依前所述,VM3:5扉牙脱胎于ⅢKM6:8之传统,如本体的双翼加持在侧,从制作方法到形态都保留了龙山时代的遗响。VM3:4则在VM3:5龙形扉牙的基础上,创造出三台阶式扉牙,成为其后三代牙璋的祖型,在二里头四期到二里岗阶段,中原所见的牙璋均为三台阶型,受到VM3:4的直接影响,可见在二里头文化的核心范围,牙璋整体的演化进程是三台阶式的扉牙取代了依附于本体的扉牙,三段式扉牙标志着二里头式牙璋稳定结构的确立。由此观之,VM3:4与VM3:5两者在扉牙结构之关系同样可以推测制作年代的先后。

除林氏外,诸多学者也都指出石峁是二里头牙璋的主要源头^[12],邓聪指出复杂式扉牙最早出现于石峁遗址,因此当命名为“石峁式牙璋”^[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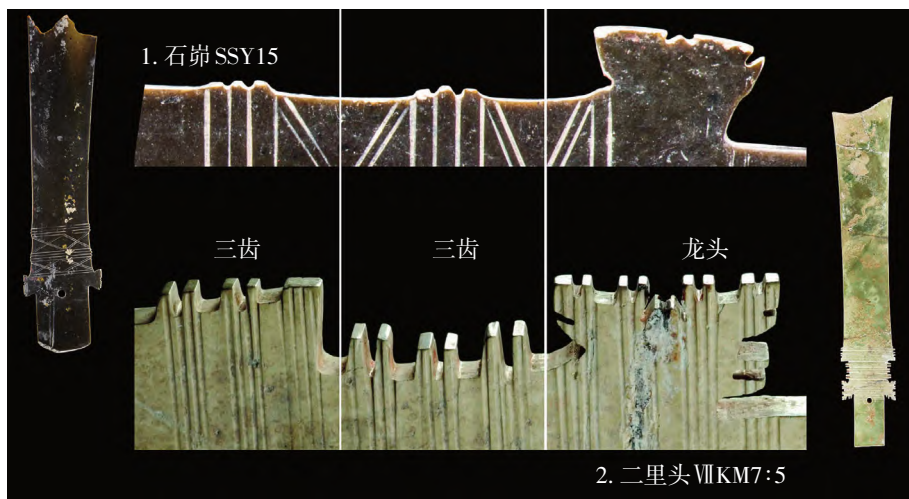
且二里头牙璋有些因素是来自石峁式牙璋^[14]。石峁牙璋的业字形扉牙与小齿的排列方式对二里头龙牙璋的扉牙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15],龙形扉牙是否为二里头首创暂无定论,其雏形见于戴应新在石峁遗址采集的牙璋SSY15(图六:1),该牙璋侧沿收束。扉牙下端呈一开口兽头状,兽头中间位置有一W形凹陷,夹有一突尖。虽结构并不完全一致,但已具备张嘴兽头之神形。此外,SSY15兽头后有两段由两小一大三个紧贴本体外沿的齿构成的山字形牙,每段之间间隔相当,且有四条阴刻弦纹连接着两侧扉牙相互对应的齿,每组弦纹之间夹有几何形方格纹饰,显示出和二里头牙璋的密切关系。二里头遗址目前所见五件牙璋,除年代较早的ⅢKM6:8和VM3:5外,其余三件均于扉牙间施以成组弦纹。VM3:4牙璋镶嵌有一绿松石原片,这是大汶口—龙山常见的玉器传统,在片状有刃玉器上开孔并镶嵌圆形的玉片或绿松石片,与VM3:4牙璋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钺也被绿松石圆片镶嵌,这种行为与组合并非单纯的装饰意义。同时,牙璋柄部有一缺角,由于抛磨平整光滑,加之附着物较多,难以判断是有意切割出缺角还是受限于玉料形态取最大体积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类玉器中常见尾端有一处缺角或破裂的现象,推测可能因这些工具的原型多为装柄使用的石质工具,在装柄使用过程中由于反作用力尾端发生崩裂,可能会留下一个类似的破裂面。可以观察到夏商时期不少玉铎、玉凿尾端是有意以锯片切出一个平整的斜面,这种“缺角”行为是否是对这种使用后工具状态的模拟,还是玉器制作过程中某种特定的仪式行为,有待进一步讨论。其余几件二里头牙璋都未见有此现象,但这种缺角的传统,却在石峁遗址出土牙璋中十分常见。邓聪曾提到,石峁牙璋与二里头牙璋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缺环^[16]。近年邵晶根据石峁遗址出土牙璋的层位关系判断,扉牙形态简单的“素牙”牙璋和形态复杂的“花牙”牙璋(即石峁式牙璋)存在年代早晚关系,前者早于后者。石峁式牙璋可能现于石峁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900—

1. 二里头 VM3:5 扉牙后侧龙头及倒角减地工艺示意
2. 二里头 VM3:5 扉牙前侧龙头所见倒角位置
3. 大汶口文化牙璋倒角减地工艺制作扉牙

1 打破关系示意，圆表示完整，另一端表示被打破



图五 VM3:5 扉牙减地工艺示意



图六 二里头 VM7:5 与石峁 SSY15 扉牙结构对比

3800 年^[17]，由于石峁文化绝对年代下限早于 1980 VM3 所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绝对年代，故而张嘴兽头的扉牙制式和扉牙之间的阴刻纹，应来自于西北的文化传统。

三 大冢牙璋的年代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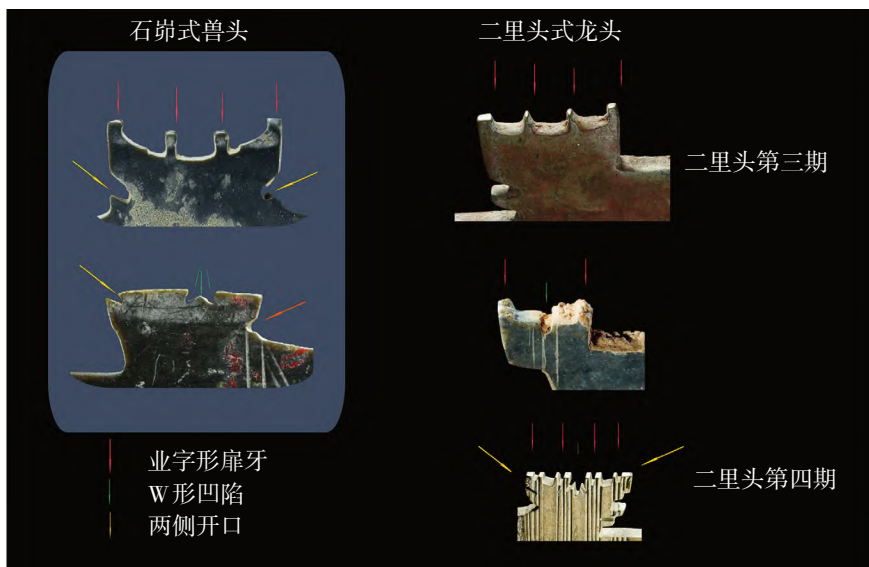
由于玉器具备不易损坏可长期使用的性质，且常有前代遗玉被留用进而出现在晚期单位等现象发生，导致玉器的生命史过于漫长，玉器的类型学也因这种干扰因素并不可靠。然而，对比二里头之前龙山时代诸龙山文化出土牙璋和二里头之后商代诸遗址出土牙璋，均与二里头牙璋存在着一定差异，二里头文化牙璋具备独特风格和稳定的特征性结构，支撑以类型学方式对二里头

牙璋研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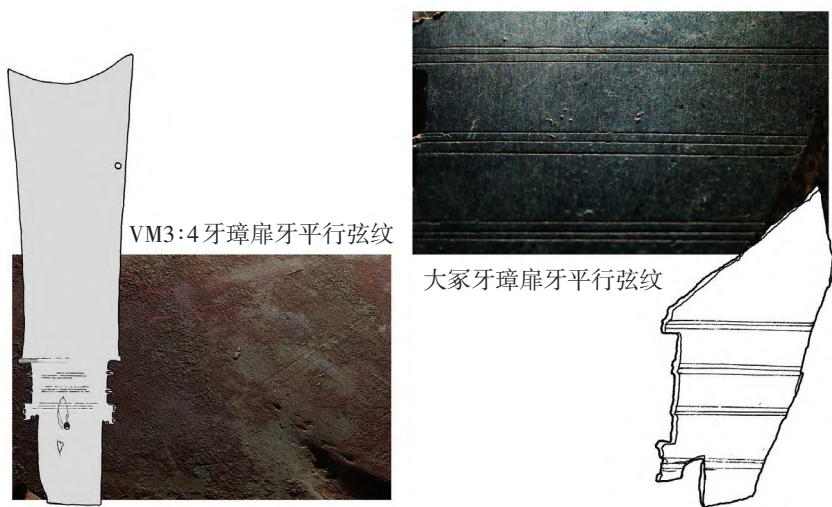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条件，重新考察大冢牙璋的诸特点，虽然该牙璋残缺不全，但最具类型辨识度的位置均较好保留，已兼具三台阶型结构、龙形扉牙以及扉牙间成组阴刻弦纹等特征，其上限理应不早于 VM3:4 的制作年代，而早于 VII KM7:5，以下进行详述。

1975 VII KM7:5（图六：2）牙璋是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一般认为其出土单位为四期晚段的墓葬。该牙璋整体上延续了 VM3:4 的二里头式特征，但其扉牙的几个细部特征，仍值得讨论。首先，VII KM7:5 的龙头被郑光称之为“向背张嘴兽头”造型，左右两边有两个形象一致

的兽头，正向龙头和背向龙头的上部沿中间一 W 形缺口呈轴对称，将其与 VM3:4 比较，若抛开或忽视中间的 W 形缺口，与 VM3:4 的龙头结构几乎一致，近似于石峁式牙璋中的业字形扉牙，若将 VII KM7:5 龙头之上每组列齿视为一个完整单位，前后两龙头之上有四组列齿，每组之间间隔相当，则龙头整体与业字形扉牙结构几乎一致。VII KM7:5 龙头间的 W 形凹陷亦可溯源至石峁 SSY15，似乎在龙头结构的设计上，年代更晚的 VII KM7:5 反而显示出更加强烈的石峁因素。VII KM7:5 龙头后几组齿的排列形式也与 SSY15 极为相似，VII KM7:5 台阶状凹陷（龙身）上有三组列齿，对应三组弦纹，靠近本体部分（龙尾）同样有两组列齿和一个方形平台，从弦纹看来，尾段同样应视作三组独立的齿，因为即使是分隔台阶



图七 石峁式兽头与二里头式龙头扉牙对比



图八 VM3:4 与大冢牙璋扉牙弦纹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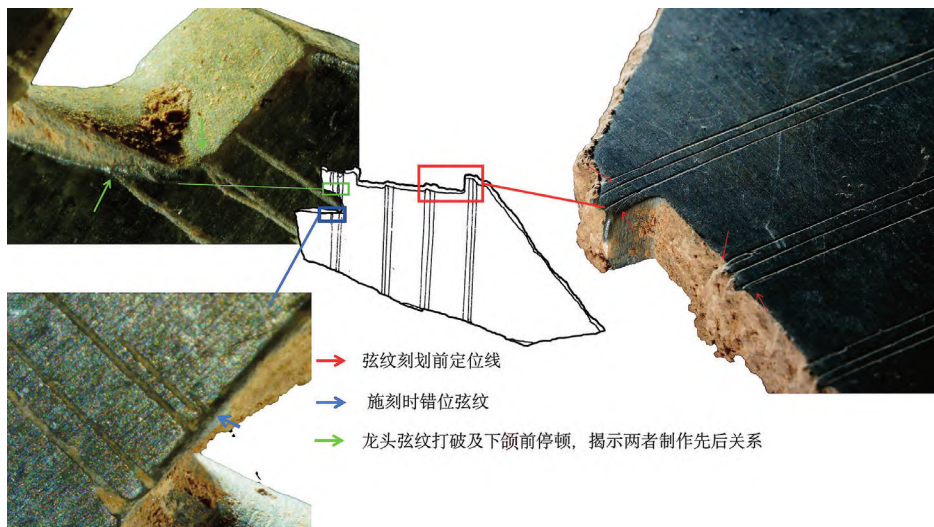
结构的方形突柱也有一组对应齿的弦纹穿过，将方形突柱从中间处研磨出一道深U形凹槽，因而方形突柱结构上也是作一齿，所以在这组扉牙结构中，可以视为“龙头+三齿+三齿”的组合，而前文已述SSY15为“兽头+三齿+三齿”的组合方式（图六），质言之，ⅦKM7:5的扉牙结构深受石峁式牙璋之陶染。然而，该件牙璋的阴刻线与众不同，每条弦纹均具有一定深度，宽度更是VM3:4的二至三倍。

大冢牙璋扉牙同VM3:4结构基本相同，分为龙头、头后台阶式下沉。一个平直的长边虽被板结土壤覆盖，依稀可辨上有两组列齿，之后台阶升起，一个方柱形齿耸立，与本体相连。大冢牙

璋龙头仅有一象形轮廓，未开口，龙头之上有前后两齿，前齿有一处破裂打破了顶部平整的研磨面，可能是毁器时造成的。从两齿之间的加工程度来看，应将VM3:4式牙璋扉牙结构“4-2-2-1”简化为“2-2-2-1”，因此整体形态呈中间无齿的舟底形，沿中部一V形凹陷轴对称，龙头后两组列齿的组合以及与齿对应的弦纹与VM3:4关系密切。又同ⅦKM7:5一脉相通，ⅦKM7:5龙头上的W形凹陷中夹有一深V形缺口，使龙头两端沿该缺口中轴对称。（图七）VM3:4的龙头处有隐现三条弦纹，而大冢牙璋亦有三条平行弦纹穿过龙头（图八），沿V形凹陷左右对称，这一特质在ⅦKM7:5上亦可被观察到，成为此种传统之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大冢牙璋的“龙头”和“弦纹”的

制作上有其独特的技术特征。首先A面龙头的正脸处有一条平行于边缘的片状锯切割痕，边缘基本磨圆，且被往复的摩擦线痕打破，是牙璋上保留的较为古老的制作痕迹，推测为玉工在制作扉牙时定位龙头位置和形态而施，这种痕迹不见于二里头出土的其他牙璋上。其次，大冢牙璋的平行弦纹刻划，对比二里头另外两件有平行弦纹之牙璋，则有着极为特殊的工艺特征。据观察该牙璋弦纹应是由有龙头一侧向龙头断裂一侧垂直刻划，然在靠近扉牙一侧可以观察到几处显著的短曲线，每条弦纹的右侧或向下打破一条与之对应的短曲线，应是在刻划前（可能是制作扉牙阶段）而留下的弦纹位置定位线。（图九）从后续



图九 大冢牙璋弦纹工艺特征

线状磨痕的打破关系来看，并未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些用于定位的弦纹进行磨灭。不仅如此，可以观察到大冢牙璋的弦纹在龙头下方掏空位置的延续情况，是遇空处停顿，至牙璋体上再重新起刻，根据弦纹打破龙头下颌这一点来看（图九），该牙璋的制作工序极有可能是先制作好龙头等扉牙，再刻划弦纹，与ⅦKM7:5牙璋先刻划深阔弦纹，再细致雕刻龙头有着极大差异。大冢牙璋弦纹平而浅，与ⅤM3:4更为接近。行为考古学家Schiffer曾指出，操作序列的差异，并不能简单解释为工匠的知识、经验与习惯，而是多种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18]。这背后的情境因素变化可能预示着时代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埋藏于二里头三期晚段的三件牙璋的制作年代，ⅢKM6:8最早，ⅤM3:5次之，ⅤM3:4再次。而大冢牙璋的年代应晚于第三期晚段，又具备早于ⅦKM7:5的结构特征，因此将它的制作年代置于ⅤM3:4和ⅦKM7:5这两件牙璋之间可能是较为合理的。

四 结 语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二里头式牙璋的形成过程，该过程令我们观察到自龙山时代以来玉器传统的诸多变化。在二里头第三期牙

璋初现时，山东龙山式的扉牙被作为最初的选择，而后山东龙山传统式微，石峁文化的许多风格特征被改造并挪用于二里头牙璋之上，并奠定了二里头式牙璋的主要形式，上述讨论中，我们得出如下观点：二里头式牙璋的某些主要特征，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石峁文化和山东龙山文

化牙璋中，但二里头时期这些特征被加以改造组合，形成一种典型的扉牙结构。可以说夏商时期牙璋在南中国广泛传播，一定程度得益于二里头对牙璋的重新塑造，我们推测这种塑造使得牙璋具备了更高层面的宗教和政治意义，而本文对牙璋细部特征的考察，就意在揭示塑造行为的表征。

前文对二里头牙璋结构的讨论中，我们揭示了二里头人在不同阶段对牙璋风格的创新和对前代传统的“取舍”，更像是一种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换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二里头牙璋扉牙的动态变化不仅仅是图形和外观的变化，更是一种活跃的媒介，沟通着隐含的意义。这些结构的变化、基调的形成，无不体现着玉器本身的能动性与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情境。基于牙璋在二里头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作为二里头玉礼器群中的重器，在早期国家的礼仪仪式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与政治和社会权利密切关联的。有学者曾提出一个有趣的政治假设，特定器物风格的变化代表着社会动态和集体记忆，控制风格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行为，进而塑造社会记忆，来形成有利的社会秩序^[20]。二里头的牙璋传统在被塑造之初，有选择地延续了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之后又转换方向，选择了更具石峁特色的扉牙形制。令人不禁推测，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传统有何深层含

义,而那些拥有特权的社会精英是否会通过使用特定的传统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传达他们的统治地位与文化优越性。换句话说,由于玉器的特殊社会价值,二里头牙璋扉牙结构的历时性变化,不单关乎审美或文化传播,可能涉及了权力和仪式的表达,作为政治精英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这些结构的内涵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才能被理解。李旻也曾撰文指出,二里头的丧葬习俗与核心符号代表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在伊洛盆地的早期国家中的聚合^[21]。相较于传播,二里头牙璋扉牙变换的历程是深谙着龙山时代扉牙规则的人物在重组、重构,并创建了一种新的秩序。在二里头早期国家背景下,玉器的使用方式和制作工艺可能象征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在随后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二里头牙璋对新的牙璋结构的构建与对不同旧传统的舍取之背后,也很可能暗示了人群的流动以及特定知识的流传。

(本文所使用照片、线图由通讯作者邓聪拍摄、绘制。感谢山东大学赵孟坤给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等单位在文物资料整理过程中提供莫大帮助,一并申谢!)

- [1] [3] [14] [15] 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5).
- [2] 王毅,邓聪主编.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5] 邓聪.牙璋在中国西北的扩散——甘肃牙璋[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24);邓淑苹.牙璋探索——大汶

口文化至二里头期[J].南方文物,2021(1);朱乃诚.从牙璋看夏文化向南方地区的扩散[J].江汉考古,2021(6).

- [6] 邓聪,栾丰实,王强.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C]//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 [7] 栾丰实.再论海岱地区的史前牙璋[J].中原文物,2020(4).
- [8] 邓聪.牙璋述要[C]//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编.二里头玉器与夏王朝I[M].北京: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 [10] Ian Hodder.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1] 林巳奈夫.关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J].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1996(3).
- [12] 邓聪.牙璋在中国西北的扩散——甘肃牙璋[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24);邵晶.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远程交流——从牙璋、鹰笄、虎头等玉器说起[J].中原文物,2021(3).
- [13] [16] 邓聪.牙璋在中国西北的扩散——甘肃牙璋[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24).
- [17] 邵晶.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远程交流——从牙璋、鹰笄、虎头等玉器说起[J].中原文物,2021(3).
- [18] Micheal Schiffer, James Skibo. The Explanation of Artifact Variability [J]. *American Antiquity*, 1997(60-1).
- [19] 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權誕生の考古學[M].东京:講談社,2003.
- [20] Ian Hodder. *The Uses of Style in Archae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1]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J].考古学报,2017(3);Li Min. *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责任编辑:贺传凯)